

略論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的理論來源 與實踐探索

鄭德全*

摘要：中國自古代起即有大學精神，雖然古人倡導的大學精神和今天的大學精神有差異，但是，它對中國近代大學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卻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蔡元培汲取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後，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指引下，開始了在北京大學的實踐。他整頓校風，改變學生的觀念；整頓教風，不拘一格聘用教師；大膽創新，改革管理體制；聯繫實際，改革學制，創造了北京大學的輝煌。面對新的形勢，當年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給我們帶來如下啟示：大學精神的倡導與校長密切相關；大學精神的倡導與培養人才密切相關；大學精神的倡導與思想自由密切相關；大學精神的倡導與寬容的人際環境密切相關；大學精神的倡導與大學創新密切相關。

關鍵詞：近代教育 大學教育 大學精神 蔡元培研究 理論來源
實踐探索

一、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的理論來源

蔡元培 1868 年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1872 年“進家塾讀書。……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小書’。”開始了他的啓蒙教育（高平叔，1996：13）。1885 年 9 月，“赴杭州，應鄉試，未中。……雖不曾考中，但他很留心旅途及考試的情景，五十多年後，還回憶得很細緻”（高平叔，1996：31-32）。1888 年 9 月初，再“赴杭州，應鄉試，未中。”（高平叔，1996：38）但已經有了“傳誦一時的所謂蔡元培的‘怪八股’。吳稚暉對此有過生動的描述：‘當余尚未知有江洋大盜孫汶，前五、六年時，卻知有蔡元培者，浙江闈星中有三篇怪八股，能得風氣之先，意其人或一怪誕駢弛之士，不知當時彼乃二十三、四歲之間恂恂儒者。’”（高平叔，1996：39）1889 年 8 月底，第三次“赴杭州，應鄉試。10 月 9 日，浙江鄉試放榜，蔡先生中第二十三名舉人。”（高平叔，1996：44-45）1890 年 3 月中旬“往北京應會試，5 月 30 日，蔡先生中第八十名貢士”（高平叔，1996：47-49），1892 年 3 月，“往北京，補應殿試、朝考。5 月 10 日，在保和殿補應複試。5 月 22 日，應殿試。5 月 26

* 鄭德全，淮陰工學院圖書館館長、研究員。

日，光緒帝‘禦太和殿傳臚，授一甲三人，二甲一百三十二人，三甲一百八十二人’，蔡先生中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5月29日，應朝考。6月8日，光緒帝召見本科進士，授蔡先生為翰林院庶常館庶吉士。10月離開北京，回到紹興。”（高平叔，1996：53-57）1893年6月2日，離開紹興，“出遊。由寧波至上海，又乘長江船往南京、鎮江、揚州及靖江縣。”8月初旬前後，過香港。到廣州，聽到一些廖季平和康有為的軼事。冬由廣州到潮州。聽到一些梁鼎芬、康有為的瑣事。1894年4月1日，由潮州到上海。春，由紹興赴北京。6月1日，光緒帝召見壬辰科散館人員。蔡先生以二甲庶吉士被授為翰林院編修（高平叔，1996：60-64）。

讀了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蔡元培從接受啓蒙教育開始，到被授為翰林院編修的20多年裡，一直受到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讀的是四書五經，走的是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的老路子。其中，他雖然遊歷過江蘇、上海、廣東、香港，接觸過康有為的思想，但目前尚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這些遊歷和接觸對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過什麼劃時代的影響，可以說，這20多年來，他的思想總體上是和那個時代相適應的。假如不是發生了甲午戰爭，蔡元培或許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編修，而中國近代史上卻會少了一個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資料表明，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對他的刺激很大，是他回頭審視清王朝前途和命運的一個新的開始。他逐漸認識到如果循着封建主義的老路子走下去，國家、民族、個人是沒有未來和希望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自甲午以後，朝士競言西學，子民始涉獵譯本書”（蔡元培，1999：18）。他是在“國勢日危的形勢影響下，關心時局，尋求思想和政治上的出路，一改舊日所學，留心西學，思想為之一振”（唐振常，1985：15）。在政治上，他支持變法，但對康梁的一些主張不甚贊同，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着手，他們想要靠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全部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還是回家辦學堂罷。”（高平叔，1996：133）根據資料記載，蔡元培從1894年進京，到1898年秋棄官回家鄉紹興，四年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閱讀翻譯著作，留意時局變化……他在日記中流露出當時的內心世界：‘都無作官意，唯有讀書聲’。”（蔡建國，1997：31）他在北京做編修的四年，恰恰是近代中國多災多難，處於西方列強競相瓜分的歷史時期之一。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1897年德國派兵侵佔了膠州灣，沙俄則染指旅順口、大連灣。在這一連串的事變中，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對國人尤其是具有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的刺激最大。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蔡元培從關注和學習日本文化入手，通過閱讀日文書籍和接觸日本人士，瞭解近代日本文化和教育體制的發展狀況，這段經歷，對他早期近代化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蔡建國，1997：93）。或者說，對他日後倡導的大學精神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關注日本教育的同時，他還把目光轉向了西方。1907年，蔡元培開始了在德國為期四年的留學生涯。這四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07年到1908年秋，這一年多，他居住在柏林，以學習德文為主，同時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書籍，並為友人的孩子輔導國文取得兼職的報酬，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過着勤工儉學的生活。第二階段，從1908年10月15日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到1911年回國。根據現有的資料，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修學的課程達40

門之多，重點集中於哲學、德國文化史和歐洲歷史、比較文明史、美術史與美學、心理學等學科。德國的學術思想，特別是洪堡的大學理念對蔡元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追溯蔡元培先生早年追求功名、進京做官、辭官回鄉辦學、學習外文、去德國留學的經歷之後，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他後來在北京大學倡導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大學精神，其理論來源和形成，與他早期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而積累的深厚國學根底，以及不斷學習外來文化，尤其是德國文化是緊密相連的。他後來在北京大學所做的一切，都深深烙上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特別是日本大學、德國大學及洪堡思想的印記。

說到這裡，有必要梳理一下蔡元培先生從接受啓蒙教育開始，到遊學國外的幾十年間，到底吸收了哪些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特別是日本大學和德國大學，以及德國著名的教育家洪堡的大學教育思想，或者說，這些文化和大學精神的內涵及思想對他形成“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產生過怎樣的影響？關於啓蒙教育，蔡先生在《自寫年譜》這樣寫道：那時候入私塾，有兩種讀書法，其一是先讀《詩經》，讀完《詩經》，讀四書；其二是先讀《三字經》等，然後接讀四書。教蔡元培的周先生採用的是第二法，即先讀《三字經》等，然後再讀四書。到14歲那年，蔡先生（1999：3-7）說他已讀過四書及《詩》、《書》、《易》三經。上述文字表明，在蔡先生讀書的那個時代，無論何種啓蒙教育，四書是必讀的。那麼，作為四書之首的《大學》主要講什麼呢？南宋哲學家、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認為，《大學》提綱挈領地概括了儒家為學（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思想精髓，所以，朱熹把《大學》列為四書之首。儘管這裡的《大學》並不是今天所講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概念，而是古人相對於“小學”而言的“成人”之學。換句話說，是古人相對於基礎教育而言的高等教育。它所展示和倡導的大學精神，也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大學精神。但是，《大學》提出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古代的大學精神。朱熹把“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稱為大學之三綱領。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稱為大學之八條目。在朱熹看來，“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的“三綱領”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邏輯上是遞進關係。“明明德”，是大學生命的邏輯起點，經過“新民”，達到大學生命追求的最高價值，即“止於至善”。但是，要實現大學教育“止於至善”的目標，光有“三綱領”還不夠，必須同時把落腳點放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上。可以這樣說，《大學》提出的“三綱領”、“八條目”實際上就是儒家教育提倡的教育由內到外，推己及人、修齊治平的大學精神。這種精神培養受教育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要求他們“無恆產而有恆心”，以“朝聞道，夕可死”的精神以求“得道”。於是，這種精神就演化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為五斗米折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格言。而這些精神和格言就成為中國讀書人自古以來一脈相承的道德傳統和終極的價值目標。

作為進士，作為翰林院的編修，蔡元培先生對中國上述這些傳統文化內涵的理解是不言而喻的。至於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則主要受日本和德國，特別是德國大學，以及洪堡思想的影響。先說日本，從漢朝開始，日本就一直以中國為師。鴉片戰爭之後，日本轉向西方學習，在不到 30 年的時間裡，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運動，使國家體制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一躍成為亞洲的強國。在這一運動中，日本人塑造出了自己的明治精神。其特徵“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一是國家精神；二是進取精神；三是武士精神。”（松本三之介，2005：11）日本人以這三種精神為指導，奉行“脫亞入歐”的政策，提出“文明開化”的口號，把教育作為國家之大本，頒佈《學制》，強制性推廣小學教育，致力於開設高等教育、師範教育、外國語教育和職業教育。1886 年，日本政府頒佈《帝國大學令》，同時將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下設法學、醫學、理學、工學和文史五個分科，培養的高級人才也顯著增多。在興辦近代教育時，日本政府還積極派遣留學生作為其實行“文明開化”政策的一部分（米慶餘，1988：159-171）。其慶應義塾私立大學提出的獨立自尊和挑戰的大學精神，為日本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再來看看德國，德國最古老的大學是創辦於 1349 年布拉格大學，以及稍後的維也納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等，因為布拉格和維也納現已不在德國境內，所以人們習慣於把海德堡大學看作是德意志境內第一所古老的學府。雖然德國大學的歷史較歐洲其他國家的大學晚 200 年，但它後來居上。經過 18 世紀兩次大學改革運動，特別是柏林大學的實際創辦人洪堡提出：“獨立性、自由與合作三者相統一；教、學與研究相統一；科學統一”的三條高等學校的辦學原則，成為柏林大學的大學精神之後，使柏林大學取得極大的成功，成為德國高等教育的榜樣。學術自由和科學研究的精神在德國大學蔚然成風，德國大學思想開始傳播到世界各地（賀國慶，1998：14-51）。下文將探討這些外來文化和大學精神，對蔡先生主政北大時發揮的影響和作用。

二、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的實踐探索

從 1898 年蔡元培離京南下辦學，到 1907 年去德國留學，10 年間蔡先生不停地奔走於紹興、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其主要活動經歷是：在紹興中西學堂任監督；為人校訂書錄；點校譯本《茶花女軼事》；受聘剡山書院院長並授課；任上海澄衷學堂代理監督；受聘南洋公學特班教習；議辦《開先》旬報；創辦《選報》；出席教育籌備會議，議定中國教育會章程，被推為中國教育會事務長；在南洋公學班教授日文漢讀法；遊歷日本；創辦愛國女學；成立愛國學社，被推為總理；從馬良（相伯）學習拉丁文；籌辦紹興公學；與愛國學社社員在張園舉行演說，倡導革命，宣傳愛國思想；召開拒俄會；成立軍國民教育會，與諸生同練兵式操；因從事革命活動，清政府、上海工部局曾密拿傳訊逮捕蔡元培等人；組織對俄同志會，出版《俄事警聞》；受聘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為該館編譯教科書；與陶成章等在上海熟商革命進行之法；《俄事警聞》終刊後，出版《警鐘》日報，將對俄同志會改為爭存會；探視被關押的鄒容、章炳麟；與陶成章

等商議回應黃興的湘、鄂兩省同時舉事，促進浙東兩派革命黨合作；光復會在上海成立，為會長；1905年加入同盟會；與陳獨秀共事；被孫中山委派為同盟會上海支部部長；任譯學館國文與西洋史的教授；與人共同校訂《最新修身教科書》等（王世儒，1998：35-97）。從上述活動事跡可見，10年間蔡元培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開辦教育與從事革命。開辦教育為他日後出任教育總長和當北大校長積累了經驗，革命生涯則使他成為先輩元老，這兩者的結合，就註定要讓蔡元培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他人生光輝的一頁。今天人們說到蔡元培的時候，往往記住的不是他的革命經歷，曾經做過什麼大官，而是他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尤其是高等教育事業做出的偉大貢獻。說到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就必須談到他在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對大學精神的實踐探索。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視事。那一天，北大喜氣洋洋。顧頡剛後來回憶道：“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得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陳平原、鄭勇，1997：171）從那時開始，蔡元培在北大前後做了10年又半的校長，開啓了胡適稱之為“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北大，這個日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驕傲的學校，成了當年蔡元培倡導大學精神的實踐基地。因為他在北京大學的作為，人們說蔡元培不僅是北京大學的校長，也是中國的校長。說他是北大的校長，因為他是現代北大的締造者；說他是中國的校長，因為他是中國大學精神的締造者與實踐者。馮友蘭則稱：“蔡先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教育家”（陳平原、鄭勇，1997：162）。

談到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就得介紹一下當時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叫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留下的唯一成果。因初辦時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官僚習氣十分嚴重。大多數學生與教師仍是前清老爺式的作風，腐敗已經深入北大的骨髓。顧頡剛這樣寫道：“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並無什麼變化……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老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份，不容許有新思想……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那時的北大還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妓院所在地）。……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裡像什麼‘最高學府’？”（陳平原、鄭勇，1997：170）為了改變北大，蔡元培到校之後，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並以這個精神為綱領，提出改造的思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求學問的興會；提倡進德會，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演講團與《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蔡元培，1999：119）為此，他主要做了四件事情：整頓校風，改變學生的觀念；整頓教風，不拘一格聘用教師；大膽創新，改革管理體制；聯繫實際，改革教學體制。

（一）整頓校風，改變學生的觀念

蔡先生對北大的改革首先是從整頓校風，改變學生的觀念開始。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中，他（1998：163-164）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他（1998：166）認為“大學純粹是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在蔡元培看來，一所大學的校風和學風是密切相連的，沒有好的學風，就不會有好的校風。蔡校長執掌北大後，不再公佈學生的學習成績，希望以此來告訴學生，到大學是為學問而求學，為做人而求學，不是為成績而求學的，努力消除學生讀書的功利思想。蔡先生一直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是培養具有鮮活個性的人。為創造良好的學習風氣，讓學生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人格，盡一份社會責任。為此蔡先生採取了五項措施：“一是改革招生制度，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的標準，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青年有機會進入北大攻讀；二是重視課程的改革和建設，注重提高教學質量；三是興辦學報，使師生提起學理的研究心，並有交換知識機會；四是重視辦好圖書館，並整頓擴充實驗室，為教學和科學研究提供條件；五是創辦研究所。”（丁石孫、蕭超然、梁柱等，1999：128-130）他還十分注意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引導到學術方面來，以消除過去學生追逐仕途利祿的不良風氣。在他的倡導下，北大各種學術活動頻仍，演講內容有專題學術報告，也有普及性介紹，既有校內的知名學者，也有世界著名的專家。蔡元培深知，要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吸引到學術研究上來，除了改變他們的觀念，創造良好的學風，還有一條最重要的就是啓發學生的自動精神。因此，他積極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開展課餘學術活動。由於蔡校長的支持，這一時期的北大學生創辦的學會和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有系級的，有系際間的，有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組建的，還有校一級的。其中一些學會不僅在北大很有名氣，在當時的社會上也很有名氣。如“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還有“靜坐會”等體育組織。顧頡剛後來回憶：“自那以後，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了。”（陳平原、鄭勇，1997：173）

（二）整頓教風，不拘一格聘用教師

蔡先生認為，要落實“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提起學生研求學問的興趣，必須要有“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來認真教授”。對於北大而言，改革學生的觀念固然重要，但改革教員的觀念也不能忽視。對於一所大學來說，要學術自由，首先要有寬容的精神，也就是他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大學精神。他覺得，“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蔡元培等，1999：7）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之下，蔡校長在建立一支適合教學的師資隊伍時，

真正做到了兼容並包，他大力主張選聘教師的“六個不論”：

1. 不論派別

當時北大教授中的政治派別有：帝制派、復辟派、國民黨、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即後來的共產黨）。哲學派別有：尊孔派、反孔派、中西各派。文學派別有：文言派、白話派和中西各種學派。歷史學派別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唯物史觀派。語言文字學派別有：舊派、新派。經學派別有：古經文派、今經文派。

2. 不論年齡

胡適、徐寶璜、朱家驊等人被聘為教授時只有 20 幾歲，大部分名教授也不過 30 多歲。據 1918 年統計，全校教師 217 人，其中教授 90 人，教師的平均年齡為 30 歲。

3. 不論學歷

梁漱溟初中畢業，因對印度哲學有研究被聘為講師。

4. 不論資歷

王寵惠曾為國務院總理，但蔡校長只聘他做講師，因為當時北大規定兼課者只能聘為講師，魯迅也不例外。

5. 不論國籍

凡真才實學就聘之，水平低的就堅決辭退。

6. 不論政見

既聘任思想進步、知識淵博學者，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也聘用部分思想守舊，但在某一方面又飽有學識的名流，如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韓延明，1994：60-63）。

按照“六個不論”的原則，蔡校長做到了兼容並包，但他覺得這還不夠。在他看來，一所好的學校不僅要有一支優秀的學術團隊，這支團隊還必須具備優秀的道德品質，這樣，才能培養品德高尚、學有成就的好學生，走上社會的好國民。出任北大校長之後，他決心集合同志，矯弊易俗，增進道德修養。1918 年 1 月，他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他草擬的《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發起進德會組織。規定會員分為三種：甲種會員為不嫖、不賭、不娶妾三戒；乙種會員於前三種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則更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會章規定，對於入會以前的行為，均不過問；而成立之後，自己又願意入會的，則要受到會章的約束。為把這種約束落到實處，進德會組織若干糾察員負責對入會人員行為的監督和違紀的處罰執行。由於蔡先生帶頭，進德會在學校的影響很大，一些在學術上有名氣的教師主動加入，

也有不少學生自願參加。進德會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它對北大教師個人道德品質的提高，對學生的道德品質的提高都產生了較好的作用。

（三）大膽創新，改革管理體制

早在 1912 年，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在起草頒行的《大學令》中就提出，要在大學建立評議會和教授會，實行民主治校的管理體制。但是，當時的大學，包括北大，都沒有執行這個指令。各大學的校務基本上都是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等少數幾個人來辦理的。蔡先生覺得，要確立大學“以研究學問為天職”，繁榮學校的學術研究氛圍，必須給師生的學術研究以更大的自由空間。而要保證大學的學術研究具有自由的學術空間和良好的氛圍，就要建立一種保障學術自由的機制。這個保障機制就是《大學令》中的建立評議會和教授治校，實行民主管理的治校模式。1917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主持設立評議會，把它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會由評議員若干人組成。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人。這個評議會有很大權力：負責制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立法、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的學銜與學生的成績、提出學校的預算。之後成立各學科教授會。1919 年 12 月，建立了行政會議、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總務處。至此，北京大學基本上確立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制。全校工作設立四種機構分別管理：評議會，司立法；行政會及行政委員會，司行政；教務處、各學系教授會、預科委員會和研究所等，司教務；總務處，司事務（梁柱，1996：49）。教授治校，目的在於脫離政府政治的干預及意識形態方面的滲入，保證大學辦學的獨立性，保證大學在獨立條件下的學術自由，而教授治校和評議會制度的好處就在於不因校長的變換而使其制度失去作用。1923 年，蔡先生離京向總統提出辭呈時，北京政府有意干預北大，北大師生立即發起強烈的抗議。胡適發表文章說：“北京大學的校長是斷不可隨便任命的。今日之北京大學，有評議會和教授會可以維持秩序；蔡先生不回來，這種‘教授治校’制度可以維持下去的。”（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8：132）雖然北大往常是行政人員一派，教授一派，學生一派，但是每當遇到重大事件時，往往是教授與學生形成統一的聯盟，教授永遠與學生站在一起。北京大學後來發展的歷史和實踐都證明，蔡先生主政教育部時制定的，建立評議會和教授治校，實行民主管理的治校模式是正確的。

（四）聯繫實際，改革學制

蔡先生到北大，除了改變學生的觀念，建立一支兼容並包的高水平教師隊伍，實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模式之外，還對學科和學制進行了改革。他確立了以文理兩科為重點的預科、本科和研究所三級學制，並規定了相應的學習年限。關於學科設置，“蔡先生有一基本看法，學與術雖關係至為密切，而習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學也。雖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為的，終身以之；所兼營者，不過教授著述之業，不出學理範圍。法、商、醫、工，術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可有永久研究

之興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務於社會；轉以服務時之所經驗，促其術之進步；與治學者之極深研幾，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學為基本，術為支幹，不可不求其相應。蔡先生原設想：(一)擴充文、理兩科；(二)預備法科獨立；(三)商科歸併法科；(四)截止辦工科；(五)改革預科。實際推行者有(一)、(三)、(四)、(五)項。”(錢理群，2000：251-252)實事求是地說，這種以文、理科為主，重視基礎學科研究的構想對北大當時及其後的學科建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在中國大地上首先確立了現代大學制度。他提倡選科制，改年級制為選科制是和他主張建立發展個性的新教育相一致的。按照北大原來的舊學制，各系所開設的課程，對本系學生均為必修課，且各系學生不能兼習他系課程。實行選科制後，學生除完成本系規定的必選課之外，有一定的學時選習相關學科的課程。這樣一來，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興趣，研究他們喜歡和嚮往的學科，學生只要修滿學校規定的學分即可畢業。為防止學生憑興趣盲目選科，或旁聽的課程過多，而忽視基本理論、基本知識的掌握。學校對學生選科的要求和確定，分別由本科和預科教授會負責給予指導，力爭學生全面發展。此外，蔡先生還進行了其他改革，諸如：大學講義只列出提綱，以啟發學生的鑽研精神；學生的成績不再公佈；考試不合格者由學校個別通知等。自1919年北大首行選科制後，全國其他高校從1922年起，也先後採用這一學制。選科制的普遍推行，是“我國大學教育上的一個極大的進步。”(梁柱，1996：128)

三、弘揚蔡先生倡導的大學精神的幾點思考

(一) 大學精神的倡導與校長密切相關

大學是什麼？大學是人類文化發展流經的長河，是人類精神駐守的常青樹，是人類思想感情的寶庫，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民族魂，是時代的良知和智慧的火把。而大學精神則是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發展趨勢的辦學理念，是大學文化的核心，大學文化的靈魂。對於一所大學來說，它所倡導的大學精神和理念，跟這所大學的校長密切相關。校長是大學的靈魂人物和神經中樞，好的校長能帶起一所好的大學。假如沒有蔡元培，北大不會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假如沒有梅貽琦，清華不會在短時間內聲名鵲起；假如沒有張伯苓，南開不會獲得長足的發展。翻開民國早期的教育史，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凡是那個時期叱吒風雲的大學，都與這些大學有一個好的校長密切相關。1949年以前，中國處在一個動盪的時代，既有外患，又有內爭。但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的高等教育能發展、壯大，甚至輝煌，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奇跡。這個奇跡，是由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陶行知、竺可楨、胡適等一大批深受近代文明薰陶、熱情追求真理的知識份子中的精英，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們所共同創造的。

（二）大學精神的倡導與培養人才密切相關

蔡先生說，人才培養就是“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大學的良心和責任，是要培養學生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培養有抱負、有政治遠見、有廣博知識、有責任心的人。大學要教育學生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志向，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座右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使自己自覺服從於社會，服從於國家，服務於人民。2011年是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胡錦濤（2011）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的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希望學生“成為可堪大用、能負重任的棟樑之才”。什麼是棟樑之才？100年間，清華大學走出的29位大師（《揚子晚報》，2011），國立西南聯大九年間走出的諾貝爾獎得主、兩彈元勳，乃至166位兩院院士（熊劍輝、陸欣，2011），他們就是可堪大用，能負重任的棟樑之才。大學精神倡導的就是培養人才，要引導學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使大學真正成為科學與藝術的實驗室，成為青年學子崇拜的殿堂，成為博大精深的思想庫，成為精英人才的聚集地。

（三）大學精神的倡導與思想自由密切相關

柏林大學創始人洪堡認為，自由是教育第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1917年初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之後，即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作為北大的大學精神。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哺育下，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成為中國現代大學的一面旗幟。大學精神倡導的自由，主要指辦學自治和學術自由。辦學自治，也稱大學自治，它主要是指在大學與政府、大學與社會的聯繫和互動中，大學應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大學不應當逢迎，不應當媚俗，更不應當隨波逐流。學術自由，則包括思想和學術這兩個方面。正確的思想自由，非常強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正確的學術自由，則要求學者有更多的學術責任和職業道德。一所大學要想獲得世人公認，它必須有獨特之處。辦好大學要堅持思想自由，只有思想自由，才能兼容並包、寬容尊重，才有民主競爭、思想碰撞，唯此，大學才能脫穎而出。

（四）大學精神的倡導與寬容的人際環境密切相關

大學精神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兼容並包，就是有寬容的人際環境。所謂寬容的人際環境，主要講兩層意思：第一，大學應當允許一些有思想、有知識、有才華，但特立獨行，行為古怪的人自由地在校園生活，且能受到相當的尊重，比如當年北京大學的辜鴻銘，行為怪異，但學術水平很高，大多數師生都很尊重他，校長蔡先生也沒有因為他的怪異行為，政治立場而歧視他；第二，大學應當允許各種學術研究、學術理論，甚至是奇談怪論具備存在和研究的空間，著名作家蕭乾先生在《負笈劍橋》一書中，記敘了他在劍橋大學的所見所聞，在這個孕育和催生劃時代科學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元心理學教授專注於鬼學研究，並對他大談人鬼之間可以互遞信息，更令人吃驚的是，雖然偌大的劍橋除了此公無人信鬼，雖然對此公也有非議，但這鬼學家既沒有被大學評議會除名，也沒有遭到同事們的孤立、歧視或鄙夷，他得以繼續研究他

的鬼學。因此，蕭乾感慨，說正是這樣的現象，可以解釋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等這些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什麼能相繼在劍橋問世（徐方，2006：35）。

（五）大學精神的倡導與大學創新密切相關

創新是大學精神的重要標誌，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改變了人們的觀念，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經濟發展的模式，改變了社會的發展進程。其中，大學充當了這種改變的先鋒和主力軍。人類在上個世紀出現的相對論、量子論、基因論、信息理論等高新技術，都離不開大學和研究所的創新。哈佛大學因為創新，教師中誕生了近40名諾貝爾獎得主，學生則以學術卓越、全面發展、自信能幹聞名於世；耶魯大學因為創新，以盛產總統總理而驕傲；普林斯頓大學因為創新，培養出3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既是一所大學，也是一所大企業，因為創新竟然培養出3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年輕的斯坦福大學因為創新，強調不因襲任何傳統，沿着自己設定的路標前進，成為“矽谷”強大的後盾。

四、結語

北京大學教授、學者陳平原先生說：“滄海桑田，人類歷史上最為長壽且最具活力的社會組織，除了教會，就是大學。……轉瞬間，輝煌的宮殿灰飛煙滅，雄偉的軍事要塞成了廢墟，龐大的企業也可能突然破產，只有大學，還有教會，能不屈不撓，幾百年風雨兼程，一路走過來，而且越走越風光。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者都會繼續存在下去，且日益輝煌。……後人評價蔡元培，看他如何‘辦大學’，也看他如何‘談大學’。……所謂大學精神、大學文化，以及大學管理等，既是一門高深學問，也是一種日常生活。”（蔡元培，2011：14）縱觀人類的文明歷史，幾千年來得到不斷傳承和創新的，只有大學和教會這兩條人類文化流經的長河，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就是給人類帶來了恆久的精神力量。有時候，物質的力量能夠被物質的力量所摧毀，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力量卻永遠不可能被摧毀。所以，宮殿能灰飛煙滅，雄偉的軍事要塞會變成廢墟，企業可能破產；但是，作為精神力量存在的大學卻會日益輝煌。今天看蔡元培辦大學，也看他談大學，更看他怎樣用大學精神改造和振興北京大學。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在那個物質極度貧困的歲月裡，北京大學能夠在蔡先生的領導下迸發了勃勃生機，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先河，這是什麼在起作用？是精神的因素，是精神的力量。時代、國家、民族、社會、高校都在呼喚教育界能夠湧現出更多像蔡先生這樣，甚至超過蔡先生的大教育家來。

參考文獻：

- (1) 丁石孫、蕭超然、梁柱等著，《蔡元培研究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2) 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3)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紀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4) 〈百年清華走出 29 位大師〉，《揚子晚報》，2011-04-25，第 A2 版。
- (5) 米慶餘，《明治維新——日本資本主義的起步與形成》，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
- (6)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臺北：東方出版社，2005。
- (7) 胡錦濤，〈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 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經濟日報》，2011-04-25，第 2 版。
- (8) 徐方，《大學人文十四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9) 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10) 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 (11) 唐振常，《蔡元培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12) 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13) 賀國慶，《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14) 熊劍輝、陸欣，〈重走聯大路〉，《舊文摘》，2011(4)。
- (15) 蔡元培，《子民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 (16) 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 (17) 蔡元培原著，陳平原導讀，《何為大學——蔡子民先生言行錄》，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 (18) 蔡元培等著，《未能忘卻的憶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9) 蔡建國，《蔡元培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 (20) 錢理群主編，《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21) 韓延明，〈蔡元培教育改革思想及現實啟迪〉，《高等教育研究》，1994(4)。

The University Spirit Advocated by Cai Yuanpei: Theoretical Roots and Practice

Zhen Dequan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y spirit is connec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Confucian idea of Great Learning. Cai Yuanpei, the first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was a pioneer in advocating the modern university spirit an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The core of the university spirit Cai advocated is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thoughts and an all-embracing attitude based on a synthe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Cai's devotion to independent thinking, his innovative experimentation with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young talent helped to develop Beijing University into one of the majo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ai's vision of university spirit still has much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valuable ideas: that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 university's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a university should be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and freedom of thought in an atmosphere of toleranc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Modern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spirit, Cai Yuanpei, theoretical roots, practice